

平安時代的政務和漢籍

重田 香澄

要 約

平安時代において、漢籍は文学作品のモチーフや上表文等の文飾だけでなく、政策決定等を行う際の判断材料としても利用されてきた。本報告では、その様子を平安時代前期の勘奏記事と、漢籍に通暁した大学寮出身者の政治的な位置づけが変化する平安時代後期の勘文との比較によって、平安時代を通して漢籍が政務に関する情報源としてどういう位置を占めたかを考えた。その結果、平安時代前期の勘奏記事と後期の勘文とでは、典拠として挙げる漢籍の種類は大して変わらないことが確認できた。但し、和書との関係を見ると、前期には同じ政務に関する情報源として同列に扱っているのに対し、後期には漢籍は理念的な規範として、和書は具体的な事例集として扱われている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これには、政務形態の変化や儀式の整備・故実化と事例の蓄積、官司請負制成立の前提となる家の成立や家格の固定等が影響しているものと考えられる。

本 文

前言

即使平安時代不再派遣遣唐使，日中的往来依然絡繹不絕，漢籍也持續傳入，這些都是由來已久的說法。另外，在平安時代（794～1185）吸收了引進的漢籍，將其展現於在攝關期的王朝文學以及漢詩文內容的深化上，這也是無需贅言的¹。

眾所皆知，本來就是以政治目的而傳入的漢籍，當然也會運用到政治上。漢籍不光只是文章經國思想之類的政治思想的接受，或是史書、上表文的文飾，『令集解』等以唐為範本製成的注釋書。實際上漢籍也被用於政治的判断以及政策決定之際的材料和根據。

但是並不是所有從事政策決定事務的貴族都通曉漢籍。至 9 世紀前半期在大學寮（國子監）學習已經不是所有貴族子弟的義務，只有部分的人修完以儒書為專門的明經道，以史書為中心的紀傳道，法律專門的明法道等²。平安時代前期，在致力於文運隆盛的天皇底下，他們以實踐文章經國思想為目標，用其知識在廟堂建立自身的地位。

但是這種情況在 9 世紀末、10 世紀初開始有了變化。此時藤原北家佔據了廟堂的大半，相反的，在前期為數頗多、以大學寮（主要為紀傳道）出身者的身分晉升至公卿的情況則大幅減少。直接參與政策決定的人只限於少數。11 世紀左右家開始分化，到了 12 世紀則可以看到家格的固定以及家業的成立。與其說大學寮（國子監）出身者是政治家不如說是專家或是從事文書處理關係的實務官員。

這當中沒有變的是大學寮（國子監）出身者主要參與的事務之一是在做政治判断或政策決定之際負責收集資料。精通漢籍，長於漢文的寫作、處理能力的他們，除了漢籍之外，也從日本律令或是各種記錄、文書類中收集資訊，為公卿等提供判斷資料。書寫相關資料的文書稱為勘文，可見於古記錄及漢詩文集等³。

本文藉由考察在勘文中被作為根據而引用的漢籍來檢討平安時代漢籍如何被運用於政務運營，佔有何種地位，以及大學寮（國子監）出身者的地位變化¹。

1. 關於勘文

首先，針對勘文的定義來做一些基本的整理。在「前言」的部分也有提過，勘文是公卿們在政務運營上每逢需要做決斷之際，讓大學寮（國子監）的諸道以及諸官司所提出的相關事項調查報告書，內容相當多元⁴。呈報調查結果的文件在史料中使用「勘奏」或是「勘申」的用語。

「勘奏」の記事可以在最後官撰的史書『日本三代実録』（記載關於 9 世紀後半期的史書）中看到，我們可以從中發現針對天皇的諮詢，諸博士從包含漢籍的各種典籍當中收集相關記述，在一一引述的同時申述自己的看法。「勘申」的情況可見於 10 世紀之後的貴族日記。一般是在公卿所參與的定（會議）之前，諸博士或諸官司奉命調查之物，其中幾乎都有提出勘文而被稱為「勘申」⁵。

勘文的基本格式請參考史料 1，寬治三年（1089）源隆子禮喪廢朝勘文（『朝野群載』）。

勘申 從二位源朝臣隆子薨逝間。所被行事儀禮喪服經曰。為外祖父母。同疏曰。小功五月。章曰。為外祖父母。傳曰。何曰小功也。以尊加也。不過總麻。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春秋左氏傳。杜氏注曰。天子絕傍。其唯有心喪。大唐開元禮曰。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百官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三日。

就件等文雖可被行外家之義。猶非無物疑。又准據之文。經典無所見。然則心喪廢朝之禮。依時議可被行歟。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寬治三年十月四日 從五位上行直講中原朝臣章貞
從五位上行直講清原真人定康
正五位下行助教兼石見守中原朝臣在國
正五位下行助教兼越中守清原真人
正五位上行主稅頭兼大外記博士伊與權介中原朝臣師平

整個格式為「勘申 …事」之後，列舉引用的書名和本文出處，並在此基礎上附上自己的見解，然後以「勘申如件」結尾。之後寫上日期和勘申者的名字。

關於勘文的定義以及各種勘文的性質、分類，布施弥平治氏做了整理⁶。分類的方式共有三種，第一種為名稱上的分類，分為顯示勘申內容和顯示勘申本身，第二種是以勘申的主體來做分類，有諸道勘文和諸司勘文兩類，第三種是以提出的時機來分類，區分為定期提出的勘文和臨時提出的勘文。

這次檢討的對象為記載了災異以及貴人的薨等突發狀況的『日本三代実録』中的勘奏記事 and 院政期的諸道勘文。但是由於陰陽道所提出的勘文和曆道所提出的勘文基本上只引用漢籍，而明法道所提出的勘文則往往多侷限於日本律令，與本次研究的目的——比較漢籍跟其他典籍的關係不甚相符，所以排除於本次檢討對象之外。

2. 被引用的漢籍

本章檢討被引用之典籍類的變化。由於類似的話題較易於比較，所以這裡舉出天皇近親者薨逝時的勘奏、勘申記事。

首先是在平安時代前期的部分。『日本三代実録』貞觀十三年（871）十月五日條是有關於天皇祖母——大皇太后薨去時服喪之類的勘奏記事。將各勘申者所舉出專門學問的典籍整理如下。

勘申者	專門	所舉出典籍
菅野佐世 善淵永貞	明經道	『儀禮』『春秋左氏傳』
巨瀬文雄	紀傳道	『晋書』『唐禮』『唐令』 『養老令』『令義解』
橘広相	紀傳道	『養老令』『儀禮』『大戴禮記』 「劉表喪服後定」 『江都集禮』『唐禮』 「田瓊喪服條例」
都言道 菅原道真	紀傳道	『儀禮』『養老令』『令義解』 『尚書』『晋書』

由上可以發現，在經書、史書、唐令等漢籍之外日本律令等也被引用。另外，各道所引用的典籍也並不是完全沒有重複。此外，明經道在這裡雖然只有引用漢籍，但是明經道也有引用日本律令的實例，所以不能光只是因為上述記事就判定各道的專門典籍。

我將上述例子與平安時代後期的實例，史料 1 寬治三年（1089）源隆子禮喪廢朝勘文（『朝野群載』）進行比較。這是天皇外祖母薨逝時明經道的官員所做的關於服喪等的勘申。這裡舉出的『儀禮』、『春秋左氏傳』、『唐禮』，與貞觀十三年十月五日條中明經道官員所列舉的典籍並無太大差異。

從上述內容可以發現，雖然從平安時代前期到後期日本陸續傳入了漢籍，但是前期至後期作為根據被引用的漢籍並沒有什麼不同⁷。當然，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漢籍都是相當基本的材料，但是這也表示漢籍在作

為根據上，持續佔有一定的地位。

但是院政期的諸道勘文或是其他勘文基本上會列舉的依據均為漢籍⁸，而不會引用日本律令，史書等。從這點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在院政期，日本史書與中國史書被賦予的定位不同。

3. 漢籍被記述的方式

那麼平安前期到後期產生了變化的漢籍跟和書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從貞觀十三年十月五日條的勘奏記事可以看出，平安前期漢籍跟和書（在此為日本令）同等並列。這個情況也可在其他的勘奏記事獲得印証。但是到了院政期，和書已經不再跟漢籍一樣被視為根據而引用，而是在勘申者整理自己的見解處被提及。

產生這個現象的一個可能原因為，諸道官人視為專門典籍的範圍縮小到漢籍。例如，史料 1 中寬治三年，明經道勘文之外掌管朝廷記錄的外記（外史）所提出的勘文（史料 2）。

勘申 從二位源朝臣隆子薨逝。可被准行例事

承和五年十二月廿六日。芳子內親王薨・嵯峨天皇第五子。同年正月甲寅朔。廢朝賀。緣 天皇同產芳子內親王去月薨也。是日 天皇不御紫宸殿。但於陣頭。賜侍從以上酒及祿云々。天皇是嵯峨天皇第二子也。雖為淳和天皇之養子。若就本生被停朝賀歟。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寬治三年十月四日

正五位上行主稅頭兼大外記博士
伊與權介中原朝臣師平

這是外記（外史）所累積的記錄中挑選出的相關事例。而史料 1 與史料 2 為同一位勘申者所作。特意地將勘文分別書寫代表有必要以不同的立場提出兩份勘文。這可以顯示出明經道的博士跟外記（外史）所掌管的職務不同吧⁹。

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漢籍依然被視為規範，但是和書已經開始被定位為事例集。例如，在『本朝統文粹』卷二「勘申變異疾疫飢饉盜賊等事」之「天地變異人民疾疫事」¹⁰中，先舉出漢籍的依據，在「右天變地妖...」之後將所考量的事情、理念的事情（這裡是指定義方面）進行整理，然後引用兩格為「例」，顯示具體的應對方法。日本史書也有很多引用外記（外史）所寫勘文來作事例的情況，但是並沒有從中引導出理念。

由此可以看出，在平安後期規範性高並且被視為理念依據的漢籍，與具體性高在實施階段被參考的和書是如何分別使用的。此外，可以將其區分為諸道勘文跟諸司勘文。在第二章中確認的漢籍被引用為依據並無發生太大變化的情況也跟漢籍身為理念規範的地位穩固有關。

結語

雖然論述非常雜亂，但是綜合上述內容可以發現，

在漢籍的吸收、運用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大學寮出身者的地位發生大幅度變化的平安時代，漢籍依然是政策決定時重要的依據，但其定位發生變化。在平安前期漢籍跟和書都是情報源的一種，但是至後期漢籍主要轉化為擔任理念的部分。

產生上述變化的背景為，政務的運作的理論從律令轉移到格式，儀式及儀式書的齊備，典章制度的重視，事例的累積等等。而漢籍得以理念規範留存背景可以推測為古代國家的基本架構是依據這些漢籍所建立起來的。本次報告因為只有整理現象，並沒有深入討論的準備，但是可以此為一線索來探討漢籍以及專門處理漢籍的官員的定位。

注

1. 關於這個領域的討論的擴展與深化可以參照王勇、久保木秀夫編『奈良・平安朝の日中文化交流—ブックロードの視点から—』（同朋舎，2001）所收諸論文。小島憲之『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塙書房、1979），秋山虔『王朝の文学空間』（東京大学出版会，1984），桑原麻子『平安朝の漢詩と法—文人貴族の貴族制構想の成立と挫折—』（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水口幹記『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書院，2005），飯沼清子『藤原道長の書籍蒐集』（『風俗』27-2，1988），中丸貴史『『後二条師通記』における漢籍引用—日記叙述とテキスト形成—』（『学習院大学人文科学論集』17，2008）。
2. 但是這並不表示藤原摂関家之類的權貴子弟都稔熟漢籍。有權勢的貴族子弟接受家庭教育。
3. 『諸道勘文』收錄各個領域的勘文（收錄於群書類從）。推測是完成於平安時代末期。
4. 關於勘文，以有特色的為中心，在各個領域都有被研究。

瀨賀正博「明法勘文機能論」（『法制史研究』49，1999），梅田康夫「平安後期の明法勘文について」（『金沢法学』50-2，2008），佐藤均「革命・革命勘文と改元の研究」（佐藤均著作集刊行会，1991），水口幹記「天文・祥瑞の典拠とその意味—『革命勘文』における類書・図書の利用について—」（『日本古代漢籍受容の史的研究』汲古書院，2005。首次發表於1999）等。另外，川尻秋生在「日本古代における「議」（『史学雑誌』110-3，2001）中指出，隨著執行政務方式的改變，原本由文人官僚直接向天皇奏上的「議」の場合跟任務漸漸轉變為向公卿提出的勘文。

5. 「奏」跟「申」的差異在於調查結果的報告對象的不同（是天皇還是公卿）。雖然不能確定勘奏時是否有提出勘申時之類的勘文，但在『三代実録』中有幾近一模一樣形式的記載，所以可以推測應該有做成文書。
6. 布施弥平治「罪名勘文」（『日本法学』22-3，1956）。
7. 小島毅『海からみた歴史と伝統—遣唐使・倭寇・儒教—』（勉誠出版，2006）。
8. 『朝野群載』卷二十一天下疾疫間事勘文，『本朝統文粹』卷二「勘申変異疾疫飢饉盜賊等事」中的「天地変異人民疾疫事」。
9. 這個現象發生於10~12世紀之間，推測是受到下面兩項因素的影響。第一項為重建外記(外史)等的記錄、管理、檢索機能以及作業的高度化、專業化。另一項為隨著官司請負制(承包)的成立，檢索工作開始由固定家族世襲擔任。請參考井上幸治「平安時代前中期における文簿保管策の展開」（『古文書研究』50，1999）、「私有官文書群の形成—10~11世紀における太政官発給文書の記録—」（『古代文化』52，2000）。
10. 這篇勘文寫於保延元年（1135），勘申者的藤原敦光為紀傳道出身。

しげた かすみ／お茶の水女子大学大学院 人間文化研究科 国際日本学専攻